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归去来兮：  
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的机制研究

作者信息：刘泽乾 19000169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指导教师：焦长权

2024年3月

## 摘 要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高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阶层中的重要部分，高龄农民工何去何从因此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社会议题。本文以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Y 村为主要调研地点，Z 村、贵州兴义市等地为次要调研地点，通过深度访谈、数据整理等形式掌握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结现象、透视原因。本文认为：由于受到城市雇佣劳动市场的排斥，高龄农民工被迫下沉、回归县域。尽管农村为高龄农民工提供了生产生活保障，但由于农工报酬差额、农业生产不稳定、子代带来的消费困境和养老意愿低下等原因，高龄农民工展现出了顽健的务工倾向。因此，高龄农民工县域回归的主要类型为依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提供的耕地和乡村住房保障自身生计，同时积极地在县域范围内寻找可能的务工机会，从而形塑了一种建立在“半工半农”的生产方式上的“半城半乡”家庭生活模式，其中半城与半工是这一模式的主要方面，半乡与半农则是保障性方面。在主要类型之外，还存在以富裕状态为前提的主动城镇化这一补充类型，以及无回归乡村可能性从而被动城镇化这一变态类型。整体来看，高龄农民工的县域回归，不断地将县域塑造为一个新的整体性的经济社会空间，从而重塑了社会空间，又重构了社会形态，表征了未来一个重要的社会走向。县域空间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以村庄为基础，其中县城、乡镇是作为主要的生产空间，村庄则是主要生活空间并供给了部分保障性的生产，内部层级分明而又高度整合。

**关键词：** 高龄农民工； 半城半乡； 半工半农； 县域经济

# 目 录

一、回归县域：高龄农民工的必然选择 .....	1
二、半城半乡：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所采取的主要生活方式 .....	6
2.1 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县域 .....	7
2.2 县城居住、县城务工 .....	9
2.3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高龄农民工 .....	11
三、以农维生：农村的双重保障性作用 .....	15
3.1 农村的双重保障性作用 .....	15
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不容改变 .....	18
3.3 打破城市化的神话 .....	19
三、以工为业：高龄农民工顽健的务工倾向 .....	20
3.1 农民工从事工农业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额 .....	21
3.2 农业生产尤其是小农生产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 .....	22
3.3 家庭消费困境和文化建设 .....	28
3.4 传统养老文化影响下的低养老意愿 .....	32
五、县域：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空间 .....	34
5.1 县域如何承载高龄农民工的务工诉求 .....	35
5.2 县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社会空间 .....	36
5.3 县域空间的发展困境及其解决前景 .....	38



高龄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在他们逐渐离开城市雇佣劳动力市场后，回归到了哪里，又以何种的生活方式生存着，是一重要的新兴社会问题。目前学界的聚焦点主要在于高龄农民工向本土方向回流的流动状态，对于高龄农民工回流后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以及采取这种方式背后的社会机制方面缺少具体的研究。我们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Y 村和 Z 村、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开展调研，在借助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描述高龄农民工在县域这一新兴的整体性经济社会空间中所采取的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解释他们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机制。在三种生活方式中，农村居住、县域务工是主要生活方式；县城居住、县域务工的生活方式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和乡村地区有着强大的联系，并且可以向第一种生活方式转换；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由于被斩断了与乡村地区的联系，无法再回归乡村，造成了额外的社会问题。

## 一、回归县域：高龄农民工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高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问题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9562 万人，比上年增长 311 万人，增长 1.1%。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持续提高。农民工平均年龄 42.3 岁，比上年提高 0.6 岁。从年龄结构看，40 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7.0%，比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41—50 岁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3.8%，比上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50 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29.2%，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 46.8 岁，比上年提高 0.8 岁，其中 50 岁以上所占比重为 41.0%，比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7.4 岁，比上年提高 0.6 岁，其中 50 岁以上所占比重为 16.4%，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图 1 中国农民工总量与增速 (2018 年至 2022 年)



数据来源：《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sup>[1]</sup>

年龄组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6-20岁	2.4	2.0	1.6	1.6	1.3
21-30岁	25.2	23.1	21.1	19.6	18.5
31-40岁	24.5	25.5	26.7	27.0	27.2
41-50岁	25.5	24.8	24.2	24.5	23.8
50岁以上	22.4	24.6	26.4	27.3	29.2

数据来源：《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sup>[1]</sup>

从农民工选择务工地区来看，本地农民工 12372 万人，比上年增加 293 万人，增长 2.4%；外出农民工 1719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 万人，增长 0.1%。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13256 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 7061 万人，比上年减少 69 万人，下降 1.0%；省内流动 10129 万人，比上年增加 87 万人，增长 0.9%。农民工流动的本地化趋势明显。

是什么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现象和务工的本地化趋势？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阻碍了农民工城市化进程。我们认为，阻碍农民工城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户籍制度，而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户籍制度和歧视性政策虽然给务工人员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困难，但是并不能真的将他们从城市赶走。只要能找到工作，农民工即使住在桥洞底下也总是有办法留在城市的。

而中国还存在着独特的宿舍劳动体制、存在着农民工社区，这些都为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常住提供了便利。由于我国统计部门一直采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城镇化率而非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随着城镇落户条件的不断宽松，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也说明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城市化率的核心变量。

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城市会对劳动力进行排斥。相反，所有大城市都竭尽心力地、像一根巨大的吸管，抽取来自中国广袤农村大地上的劳动力养分。城市只是排斥不再能作为劳动力的、被剥夺了劳动力属性的人和过剩的劳动力。将他们的劳动创造吃干抹净，然后一脚踢开。由此可见，“城市排斥”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城市并不必然排斥农民，而是资本排斥过剩劳动力，然后以城市排斥的形式表现出来。户籍制度并不能造成如某些学者所说那么夸张的影响，没有户籍制度、还会有济贫院制度、会有贫民窟社区等等。不是城市让农民工留不下来，把他赶回农村；而是农民工活不下来，但是还能够回到农村向阴晴无定的老天爷、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讨口饭吃。将矛头指向户籍制度，掩盖了阶级矛盾。

将问题具体到高龄农民工问题上，高龄农民工由城市返回县域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排斥。王欧指出，“农民工被城市劳动力市场识别为‘大龄’之后，普遍会经历一个从相对正规到日益非正规、沿着劳动力市场层级逐渐下沉却持久地抗拒回归农业劳动的“下沉式—城市偏向”的工作流动轨迹。”<sup>[3]</sup>

我们将 50-70 岁之间（含 50 岁和 70 岁）的农民工称为高龄农民工。农民工务工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进入工厂式的结构性工作机制，另一种是从事以建筑行业为代表的散落型工作方式。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一旦农民工年龄超过 50 岁，由于劳动能力的逐渐下降、劳动风险的显著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便会逐渐受到排斥。50 岁是这一排斥初显的重要节点，而这种排斥会随着年龄的增大愈发明显，劳动力市场对于 55 岁以上年龄段农民工的排斥尤其凸显，而 65 岁以上年龄的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格外困难，70 岁以上年龄的农民工则基本已经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将 50 岁-70 岁之间的农民工定义为高龄农民工。

高龄农民工定位提前

根据国家规定的城市用工年龄标准，我们将高龄农民工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 50 岁以上 60 岁以下的农民工，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为大龄农民工，这一类农民

工虽然在就业市场中已经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仍然能合规合法的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第二类是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农民工,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为超龄农民工。他们由于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城市用工年龄标准,往往会设法进入一些并不正规的劳动场域进行劳动。

在建筑行业清退令的背景下,高龄农民工问题已在现实中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难题。尤其结合人口问题来看,我国在1962-1972年之间有一波“婴儿潮”,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大量人员逐渐成为今天的高龄农民工。50岁以上农民工在2020年还只有6800万人左右,2022年就达到了接近9000万人的数量,预计在几年内就将突破亿万大关。因此,高龄群体已经在我国的社会阶层中成为重要部分,对于整个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就业问题也必然成为重要关注对象,比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便曾明确提出维护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sup>[2]</sup>问题。

高龄农民工何去何从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学界研究聚焦于高龄农民工的空间流动。农民工的空间选择的背后是一种相应的生产方式选择,这些聚焦于农民工的空间流动的研究非常重要。其中,一些研究关注农民工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横向回流。<sup>[4]</sup>另一些研究指出小城镇是农民工回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研究由大城市到小城镇到乡村的纵向回流。<sup>[5]</sup>在已有的关于高龄农民工向小城镇地区回流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强调农民工通过买房在城镇地区实现城市化,强调农民工在县城买楼对其身份转变的重要性。另一些研究强调让高龄农民工可以自由返乡,强调农村农业对于农民工福利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sup>[6]</sup>。但是,学界研究聚焦于农民工人口流动的趋势,缺乏对农民工具体生活方式变化的敏锐认识。受传统研究影响<sup>[6]</sup>,大部分研究还将城镇—乡村视为对立发展的两个部分。

我们通过深入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大量县域农民工采取了一种居住在乡村、经营着农业的同时在县城寻求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的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县域成为了一种对于农民工生命体验层面而言整体性的生存生活空间。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Y村是我们的主要调研地点。Y村基本情况如下:全村总面积6836.4亩,耕地面积1880.01亩、林地面积2000亩。辖六个居民组、三个自然村,脱贫攻坚战开始前,全村总人口204户609人,建档立卡人口33户77人,其中未脱贫人口21户51人,脱贫享受政策人口12户26人,贫困发生率8.4%。现已全部脱贫。他们主要采取两种生活方式:第一种是高龄农民工回村定居、在

县域工作。在 Y 村 50-70 岁的户籍人员 198 名，常住人口 140 名中，完全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员有 109 人、占户籍总人数的 55%、常住人员的 78%，属于绝对多数。如果稍微放松一些统计要求，这个占比还会上升；第二种是高龄农民工在县城就地城镇化，在县城务工或从事家务劳动。这一部分有 23 人，占户籍人口的 11.6%。除此之外，我们还观察了异地扶贫搬迁造成的城镇化居民的生活状态，以作为对照。

农民工采取这种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是被其采取的半工半耕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sup>[7]</sup>首先提出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农副结合、农工（手工业）结合的立体生产方式。在农副结合中，农业处于一种主要的、根本性的地位，牧业、手工业等在这个结构中起到了增收和保障小农经济稳定性的作用。黄宗智先生明确提出了“半工半耕”（半工半农）的概念<sup>[8]</sup>黄宗智先生指出了如下几个要点：1.工主农副 2.农业的保障作用 3.指出了隐形失业人口问题，农民随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在城乡间流动 4.小农生产的负面性。杨华<sup>[9]</sup>、夏柱智、贺雪峰<sup>[10]</sup>等构建起了一个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核心概念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构建了父母务农、子女务工的以家庭为基本再生产单位的模型，强调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老年父母返乡务农的情况。我们在承认半工半耕作为一种家庭分工结构的基础上提出：随着高龄农民工群体的壮大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半工半耕”的生产生活特点超越了代际限制，成为高龄返乡农民工自己一代的特点。“半工半耕”不仅作为农民工的一种家庭结构，而且作为高龄农民工个人的择业方式登场。总的来说，这一观点是对于黄宗智先生思路的一种复归。黄宗智先生指出的四个要点，在我们使用的“半工半耕”概念中仍然十分突出。区别在于，黄宗智先生所处的时期，“半工半耕”主要是农民工应对以年为尺度的就业市场波动做出的自主选择，农民工们在经济上行周期中外出打工，经济下行的年份回乡务农。对于今天的高龄农民工而言，他们从事的务工劳动不再是长距离外出的长工，而是就近就业的短工。在同一自然年内，他们可以在打短工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年度的农业生产。

学界已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指出县城和乡村相互交融交叉、走向整体化“即以县城为中心、以小城镇/集镇为节点、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层级分明而又高度整合的新经济社会空间”的特征<sup>[11]</sup>。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主导的

经济社会功能向县一级的集中、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等原因。学界对县域城镇化的研究颇有成果<sup>[12]</sup>。不过，我们认为，县域社会经济空间的整体化发展未必以城镇化的方式展现出来。由于县域人口老龄化，高龄农民工县域社会经济空间的整体化的重要主体。而他们居于农村、就业于县域、享受社会服务于县域。从数据上来看，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杨开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镇生活圈化，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sup>[24]</sup>在未来，我们应该破除对现有统计方法下城市化率等于发展程度的思想。顺应和引导农民群众自发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财政力量做出巨大贡献。大多数学界研究在总体上和根本上肯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地区发展的积极意义<sup>①</sup>。但是，在社会舆论环境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误解和不支持情绪。一些媒体对于极少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缩编、削减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的试点性质的改革的解读几乎全是误读，造成了不好的社会舆论环境。<sup>[13]</sup>一些媒体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阵利用少数腐化干部将全体基层干部污蔑为“县城婆罗门”的妖风。另一方面，县域政府投资行为也存在着不理性投资、重复性投资等问题。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县级政府为政理念依赖资本力量，缺乏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信心和对人民群众的动员。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高龄农民工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排斥，在城市用工部门之间进行的过渡性的工作下沉，并且最终被排除出大城市之外，回归到本地乡镇。一方面，在乡村居住并且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在县域范围内（主要是县城和城镇中）寻找短期的务工机会，采取一种“半工半耕”式的生产方式，并且享受县城的公共资源。最终形成一种半城半农式的生活方式。由于交通的发展，县城、乡镇、农村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单位。县域中尚存完好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也成为发展经济和建设美好社会的抓手。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隐忧，主要是县城和乡村的政策不够具有整体性，县域经济发展依赖资本不依赖人民，房地产等行业压榨农民工消费潜力，县域经济内循环不畅，内生性不足等。

## 二、半城半乡：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所采取的主要生活方式

---

<sup>①</sup> 例如资本技术构成、政府财政支出与贫困县域经济增长

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的生活方式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龄农民工回村定居、在县域工作；第二种是高龄农民工在县城就地城镇化；第三种是异地扶贫搬迁造成的城镇化。在三种类型中，高龄农民工回村定居、在县域工作是最主要类型；同时在县城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回流农民工可能采取的一种次要的、补充性的生活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家庭是富裕家庭和老人失能需照顾的特殊家庭。异地扶贫搬迁居民所实现的、再无向乡村回归的可能性的城镇化则是一种特殊的变态。

## 2.1 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县城

高龄农民工回村定居，一方面进行农业劳动、另一方面又在县域产业（不均匀地分布在县城和周边乡镇、跨乡镇地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中积极寻找短期务工机会，这样的一种基于“半工半耕”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半城半乡”的生活选择是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的主要方式。

农民工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作为回归县域的主要方式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居住在乡村可以在不影响务工的同时更好地照顾农业生产。符合农民工采取的半工半耕的生产方式兼工兼农的要求。

第二，从居住和生活成本上来说，居住在乡村的购房成本、消费成本、养老成本都较低，利于农民工家庭资金的累积。

第三，从情感和生活习惯上来说，高龄农民工对故乡和承载着自己生存成长亲情记忆的“家”的眷恋、对土地的亲切感和对邻里之间更亲密的社交关系的追求都意味着乡村相对于县城是一个更好的定居选择。

第四，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好，能够满足高龄农民工对美好生存环境的需求。

以Y村为例，Y村50-70岁户籍人口共198人，常住村内人口140人，去除五保户6人，种植百亩以上、养殖牛羊百只以上的农业大户各1人，剩余132人，占户籍人口的66.7%。其中，纯务农而不兼打工者只有18人。在这18人中，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就占7人。并且，虽然这些人口暂时在统计中是纯务农人口，但是，仍然有选择进入城市工业谋生的可能性。在剩余的114人中，在外地打工的只有5人，在外地务工人员也仍然对县域务工机会存在依赖。如统计上记为北京务工的52岁的郑某国，虽然通过关系，得知在北京有一些小工可以做，

临时地去干了 40 多天，但他仍然非常需要县域提供的工作空间。

也就是说，在 Y 村 198 名 50-70 岁的户籍人员中，完全采取乡村居住、县城务工的生活方式的人员有 109 人、占总人数的 55%，属于绝对多数。如果稍微放开限制条件，实际人员则更多。由此可见，采取乡村居住、县城务工的生活方式就是 Y 村高龄农民工所采取的主要生活方式。

“丛某华：老头子（郑某国）在家待着，种了 5 亩来地，夏天种点地，打点零工。在北京干了 40 来天活。也是小工，一天 180 左右，后来就回家里（县城）打点零工。”

刘泽乾：你老伴找北京的活是自己出去找的还是介绍的？

丛某华：我家那个找活就是他有个兄弟，他是安水电的，平时也在家，就是外头有时候那弄楼了，他知道有别的活，他就回村里找两个人一起干。反正也得别人来找。”

表 2 Y 村 50-70 岁“农而不工”人员信息

身 份	性 别	年 龄	受教 育程 度	背景信息
妻	女	51	小学	务农
妻	女	56	初中	务农
妻	女	63	初中	务农
妻	女	59	初中	务农
妻	女	59	初中	务农
妻	女	52	小学	务农
妻	女	53		务农，身体好
户 主	男	65	初中	老组长 19 只羊流转 5 亩自种 5 亩包 10 亩，建议集中养殖，搭羊棚 摔伤手臂
户 主	男	68		长女嫁小坝子，次子张某新，自种 10 亩养猪，与张 R 张 W 关系好
户	男	69	小学	耳聋扫厕所，种 4 亩外包 3 亩

主				
户主	男	61	初中	30 羊种 7 亩地
户主	男	61	初中	1 子 1 女出嫁脑梗种 3 亩流转 7 亩，看病开销大求低保，摔坏腿
户主	男	54	初中	护林员，坝上围栏种 7 亩地
户主	男	69	初中	种包 4+7 亩地成本 500/亩流转 3 亩
妻	女	57	初中	种 10 亩豁嘴烟熏邻居不厚道
户主	男	68	小学	2 女内蒙随军黑山嘴，心脏病脑梗生活自理，无劳力，流转 3 亩自种 7 亩玉米，妻房家梁王某琴肠息肉，老两口
户主	女	70	小学	夫金某柱为退休职工，子金某国，金某柱住县城，自种 5 亩，老两口
户主	男	68		13 亩地自己种部分包出去部分

## 2.2 县城居住、县城务工

从城市回到县城居住并工作，是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城的另一种方式，从人数上来看，这种方式并不是主流的方式，此外，在县城居住的高龄农民工仍然和农村有着很深的联系。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高龄农民工并不是自己在县城有一套房，而是与子代共同居住。

采取这种特点的家庭，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一部分家庭从收入上看属于高收入群体、从积累上看属于富裕家庭、从社会阶层上来看，一般属于小企业主阶层，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并不属于农民工阶层。这一部分家庭从总体数量上而言较少；第二，一部分家庭的老人是由于部分或全部地丧失劳动和自理能力而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被迫需要子女照顾的非劳动力。这一部分家庭从总体数量上而言也较少；第三，对于尚有劳动能力、不需要照顾且有劳动意愿的高龄农民工来说，在县城与子代共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照看孙辈孩童、承担家务劳动，以解放相对劳动价值更高的子代劳动力。其中，一部分人在承担大量家务劳动的

同时也会寻找一些短期工作机会。这一部分家庭从总体数量上而言是最多的。

并且，绝大部分县城居住者也保留着在村内的宅基地和耕地，由于交通的改善，一些农民工会采取春耕在家居住，春耕后回归县城，时不时来照看一下土地，秋收时节又回归到乡村收割作物的生活方式。而对于那些因为要照顾孙辈、承担家务劳动而进入县城居住的高龄农民工而言，一旦孙辈长大不需要再照顾，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回归乡村老家老宅居住，进行一次从县城到乡村地区的居住地回流。

从数据上看：Y村50-70岁户籍人口共198人，其中，不常住在村的共58人，去除长期在外务工、在外地定居、在别村生活、当和尚的26人，选择在县城居住的只有32人，其中失能需要照顾2人、家境富裕，本身是做买卖或企业主的7人，真正在县城务工或从事家务劳动的只有23人，仅占户籍人口的11.6%。

身份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背景信息
户主	男	55	初中	修鞋，住独生女家廉租房，1女 大T镇加油站务工
妻	女	54	初中	县城务工
户主	男	54	初中	包工程，县城租房住，村内有房
妻	女	58	初中	丰宁饭店服务员，打工。
户主	男	53	初中	建筑工，村内有老房子
妻	女	52	小学	在家给孩子做饭
户主	男	51	初中	小黄沙锅老板
妻	女	53	小学	小黄沙锅老板娘
户主	男	58	中专	唐山电工，县城买楼，竞争书记， 有老房子
妻	女	56	初中	在家待着
户主	男	60	初中	在林营村生活，有老房子
弟	男	50	初中	出家当和尚，村内无房
户主	男	64	初中	厦门，崔立勇父，有老房子
妻	女	67	小学	厦门 失能半身不遂
户主	男	59	初中	县城居住，有老院子

妻	女	55	小学	在家待着
户主	男	62	高中	在家照顾妻子，住怀柔女儿家
妻	女	62	高中	怀柔失能
户主	男	63	大专	开装修公司，老书记
妻	女	63	小学	在家待着
户主	男	54	小学	珠海弘德荣业电子有限公司
妻	女	54	初中	珠海斯德恩制造有限公司
户主	男	53	初中	丰宁县城务工
妻	女	53	初中	丰宁县城务工
户主	男	55		顺义驾校教练，村里有房
妻	女	51		顺义务工

### 2.3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高龄农民工

高龄农民工的县域回归方式还存在着一种变态：在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失去了土地的高龄农民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足够的家庭条件支撑起其不参与劳动的养老生活。同时，由于离乡太远，耕种极为不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事实上丧失了对土地这一劳动资料的使用能力。他们不再拥有自己的退路，其“老根”被斩断了。

2015年底国家五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地区〔2015〕2769号)<sup>[4]</sup>，2016年全国正式开始实施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易地扶贫搬迁的兴起和贵州省颇有渊源。我们在贵州黔西南州调研时发现，贵州易地扶贫搬迁规模大、效果好、群众不满意意见小。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贵州有“天无三里晴，地无三里平”之称，传统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人均土地少，农民群众搬迁付出的机会成本小；另一方面，贵州旅游资源格外丰富，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国有及外来资本投资力度大，农民出让土地有集体土地流转收入，在集中定居点又有新兴产业、旅游业能够就业；第三，以民族文化为主打的文旅发展方式尽可能地保存了乡土生活的族群文化，生活方式更符合农民工们的旧有习惯。如，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乡易地扶贫搬迁点阿妹戚托小镇，既有来自广东省的工业投资，又有以当地特色彝族文化为基础建设的旅游产业，6000余人

基本实现全面就业。但是，这也和贵州省极大的地方债负担以及资本下乡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这造成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隐忧。同时，阿妹戚托小镇的投入之大和文旅资源之多都表明这并不是一个任何乡村都可以照搬照抄的道路。

有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个例子来透视：

在 Y 村的村口较低位置建有一个被称为“人才家园”的小区，实际上即是丰宁县大阁镇的易地扶贫搬迁点，而村口较高的位置还建有一个大棚园区，被北京来的老板承包种蘑菇（几年前是种蔬菜）。这一园区既使用 Y 村的村民务工，又使用人才家园的居民务工。我们与在村口大棚务工种蘑菇兼看大门的村民师某燕的交流比较有代表性，我将其中一个片段摘录下来：

“师某燕：他（指人才家园的务工人员）以前也都是外头打工，跑去呗，外头没事了，有的就在这干。其实人年轻人人家一直不干，人在这干都岁数挺大。那他不挣，他也没钱花，就非得挣。你买个菜，没钱也没的买，那他也没个地，在哪种菜？咱好赖还有个园子，还能种点菜。他那是分来的，他的（土地）也没有。就朝着这个地边子（指大棚园区内道路两旁极少极少的狭长绿化土地），那乱七八糟那地都让他给剗去，全都给剗上种菜了。全给剗的乱七八糟的。那都是瓦们（即我们，后文都用我们）那地给他剗了啊。是，那你说让你种点吧，大老远让你种点吧，你剗我们地。不让你种吧你也没地……嘿，人才小区来了没沾上光，就他妈滴祸害人的，啥都丢，啥都偷。你看我们下边那种点水果，那个苹果，你这没，不等他熟就都给摘了，成袋子给你拿走了，全给偷走了，啥都丢。

刘泽乾：人才家园搬迁到村口，咱们村里也沾点光吧？

师某燕：没沾着光。沾啥光了？工资降了要，要不介他要不来我们这工资都得 150 朝上，一天 150。他一来了吧我们不干人家就干，就给你闹到 100 嘛。降到一百，一百你要不干，人 80 人都有人干，那小区人他不干他也没法。给钱给多少都得挣，他少了也得干。他在家其实人也有地，还能养牲口，种地。他来了这也没地，也没牲口，不干吧，挣得少也得干，就得打工。

他们（资方）也掐吧你，你干活赖巴，就给你打发了。全等着这点活呢……

一开始你知道不？一开始来的老板说 15 块钱一个小时，那你干 8 个小时，估计还有 120 块钱。夏天干十个小时就是 150 块。让那有个娘们（北京老板雇佣

的本地管理者)来了,让她给闹(也即“弄”)下来了,合12块钱一小时。人家北京那老板一来就说他工资高,给15块钱一个小时,不都给这个老娘们闹下来了么?闹成12一个小时了,那8个小时你不就只得96块钱了么?我那天给我气的,我说你是丰宁的人,那人北京来的老板人家有的是钱,人家的钱发工资,你都给我们闹低了,我滴妈呀。她那头(丰宁县北部某营)离丰宁县城远,她那边工资是低,夏天工资是120。她到咱这一说,人老板把工资降下来了。她感情闹得好赚得多,他(老板)不让她领着我们干活么?她的话一个月也有5000闹不好6000呢。合着把我们的工资闹低了都给她补上了嘛。

刘泽乾:那你们能服她么?

师某燕:我们不服她嘛,但是我们人少,人家那小区那人不行呢,闹不到一块去。我刚刚不和你说了嘛,你们要不干人就干了。

有一回的,我跟村长反映的,我都来气。他们有小区的人在这干,我们的人也在这干,人家小区的人一个月4000块钱,我们这人一个月3000块。郑某久(师某燕老公)不也在这里干呢么?他是晚上在这看门100,让他白天再干活100。他们那个小孩干活,白天120。一个120的,一个150的,一个230的,一个170的,就郑某久这个少,100元。你凭啥都是男的,一干活你就给我100块钱,和我们(女工)一样?他就不干,给100就干100的活,给人辞了,在家歇了俩月了。后来我跟村长说,我说小斌子(郑某岩,现任副村长,是个年轻人,心思活络,干劲足。师海燕为郑某岩三姑),我说那你得说说,人家我们的人在那干活多实诚,干活全靠咱村的人出活呢,结果就给我们3000块,给人家人才家园的4000块。

大棚管咱们村闹水嘛,他得使咱们村水呢,他用我们村里的水也不给钱,那我们还要种地呢(Y村一直是缺水村,水资源极其紧张,今年大旱),就给点电费,给300块钱。小斌子就来气了,凭什么人家干活挣4000到俺们村的人就3000块?再这么着不给你们用水了。

小斌子说了之后,老左(管理者)回来了,说让我们这个表现、竞争。都写材料,往她手机里头发。我就瞅着他挣4000块的人发不。他挣4000块的人要发我就发呗。老左说了,你们要不发,你们下个月也只发3000块,最后人家人才家园的人也挣3000块了。本来人家挣4000块,我们挣3000块,那都给弄成

3000 块了，他也没给我们往上涨，那些人的工资也下来了。我们还把人家得罪了，把人家钱闹下来了。

缓了一会后，师某燕说：好在是这样心里还舒服点，要不然人家 4000 我们 3000，一个月比人家少一千，这一年下来得少多少钱啊，那都一样的干活！

其实 4000 还不赖呢。要是给 4000，你也甭说打工，在那干就行。3000 可不少呗。那你要耽误一天他还得扣呢。你谁家没有个事儿是不？你要请以前的老板，都说月工资就说请一天两天的不给扣，那她给闹的，你干一天就有你一天活，你不干她就给扣。

（此时小区里有两个老太太来捡破烂，触发报警器，被师某燕赶走了）

师某燕：小区里的，她来捡破烂来，什么也捡，这也捡那也捡，也不值钱，地管袋子闹一车也闹不了 100 块钱。老左也不让捡。之前有一次有个三轮车晚上来把破烂都捡走了，气的老左调监控把，还要报警！说是我们村的，最后人家警察来了，说不是我们村的，也找不到人了，这才不了了之了。要是我们村的，老左还得把人逮起来呢！”

和师某燕的访谈中，她提到了居住在人才家园的异地扶贫搬迁人员试图强占大棚园区绿化土地种地、偷偷采摘大棚园区苹果，我们还亲眼看到了人才家园的居民试图来大棚园区捡拾走一些不值钱的破烂，触发警报器被师某燕赶走了。这生动地体现了异地扶贫搬迁群体展现出的极大的土地渴望，并且这种渴望造成了扩散性的社会影响，增加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种地、采摘乃至捡破烂能够降低其一定的生活成本；第二，耕种和采摘的习惯是传统乡村文化塑造的农民的生活习惯乃至生活意义，当失去了耕种和采摘的可能性后，农民会感受到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无意义感；第三，当失去这种耕种和采摘的可能性后，如果再没有务工机会，在完成家务劳动后，农民会由于无活可干产生大量的闲暇时间，对外扩张性的寻求土地和作物进行耕种和采摘也成为填满这种闲暇的手段。

而师某燕生动描述的 Y 村工人、人才家园工人、资方管理者以及 Y 村村集体力量四者之间的斗争则展现出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由于失去了种植退路，是怎么降低自己的工资预期、减弱自己的斗争性，变成“乖乖工人”。Y 村工人在受到不公待遇时，积极寻找村集体力量出面维护自身权益（尽管最终造成的结果并

不是自身权益受到维护，而是整体工资水平的同时下降），而人家家园工人则被 Y 村工人认为是不可团结的，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在其工资水平被拉低到和 Y 村工人一个水平后，也没有任何的斗争手段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异地扶贫搬迁造成了搬迁农民工与当地农民工、城市工人之间不同身份认同。这种不同的身份认同被管理者轻易地分化、挑拨，造成了没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的内斗和恶性竞争，进而降低了整体的工资水平。

在三种高龄农民工的家庭生活模式选择中，乡村居住、县域务工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生活模式；县城居住、县城务工是补充性的生活模式；易地扶贫搬迁造成的城市化是一种非自愿的、政策性变态。

### 三、以农维生：农村的双重保障性作用

在三种高龄农民工的家庭生活模式选择的对比中，可以透视到农村对于高龄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意义。为什么乡村居住、县域务工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生活模式，县城居住、县域务工者是一种补充性方式，而易地扶贫搬迁只是一种非自愿的变态形式？农村老根对高龄农民工意味什么？

#### 3.1.农村的双重保障性作用

在高龄农民工被劳动力市场逐级排斥的过程中，农村为高龄农民工提供了生活保障和退路，让其可以通过务农获得一定的保障性的经济来源。农地为农民提供双重保障：耕地提供收入保障、宅基地提供居住保障。Z 村村主任杨某龙和我们说：“农村这块牵涉到农民最根本利益就是一个土地、一个房屋，别的也没什么了。过去老辈子说话：寸土不让嘛，人家种点地，起码我能活着不至于我饿死咯。诶我要是在城市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着了（方言，意指面临突发意外状况）的时候，我起码回农村我还有二亩地种呢，我种出来东西我饿不死自己。第二个是房屋，你得给我个遮脑瓜子的地方吧？要么说为什么老百姓说不卖这个房子，宁可说闲着我也不卖，就是因为哪天我要是走投无路了，我有个遮脑瓜子的地方。老百姓他自己也考虑这一点。”而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村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之一就是“人家干活没人要你了，你就回家种地吧”。

当农民工这一在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群体被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漩涡甩出雇佣劳动体系之外后，他们还可以回归到农村中居住在自家农宅进行小农生产，而

不必依赖救济制度。如果说务工是农民工那把提升社会地位的“梯子”，农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安全网”。如果农民工不归乡，他们的出路就只有流浪，部分聚集起来，在城市中形成贫民窟。中国农民工不同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分析的英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护下绝大部分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而这些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中国农民工在沦为产业后备军后，还有自己的退路，就是乡村。正是因为这种退路的存在，让中国农民工退有可退，而不是像圈地运动中“自由得一无所有”<sup>[15]</sup>的英国无产阶级一样退无可退，才使得中国农民工表现出一种“被城市排斥”的虚假表象。

在 21 世纪初期，对于尚未面临老龄化危机的农民工而言，农村、农业是应对摩擦性失业的场所。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就回来种两年地，养活自己。经济形势好转、就业难度下降时，就返回城市就业。今天，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由于受到城市的、长期的劳动市场的逐级排斥，高龄农民工的劳动呈现出就地就业、短期就业的特点，农业的保障作用除了应对摩擦性失业以外，更多的是在短期就业的条件下，兼工兼农，保障自己的生存。

而对于县城居住、县域务工者来说，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地居住在农村地区，仍然和乡村有着很强的联系，农村对他们仍然有很大的作用。高龄农民工们仍然保留着祖宅和耕地，随时可以回去居住。一方面，由于交通的发达和北方耕种一年一熟的熟制特点，一些高龄农民工们甚至可以春耕在家居住，春耕后回归县城，时不时来照看一下土地，秋收时节又回归到乡村收割作物；另一方面，对于县城务工者和承担家务劳动的人群而言，一旦其再找不到务工机会，或者孙辈长大成人不再需要照看时，他们还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回归到乡村，养老或耕种。事实上，由于在县城居住的人群，很大一部分是和子代家庭一起居住，在子代抚养压力减缓的情况下，大量采取县城居住、县域务工的人群选择了向农村居住的回流和转变。

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户来说，他们在本土本乡的“老根”已经被斩断，对于少数搬迁距离不远的农户而言，还有一些使用交通工具通勤种地的可能，但也带来了额外的麻烦，尤其是对高龄农民造成很大困难。而对大部分搬迁距离较远的农户而言，所保留的耕地实际上完全不能得到利用。这样，这些高龄农民工回归乡土的退路彻底被切断了。易地扶贫搬迁的群众也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土地

渴望心态，这一点也证明了农村地区“老根”对于县域、乡村地带群众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乡村的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乡村能够为农民工提供的只是基本的社会保障。打开国际视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不可能纯粹的依赖于农业生产实现发展，而是必须要有政府补贴或者打工来补充农业生产，甚至连美国的大农业生产者也是如此。在大工业的生产力面前，农业生产力量始终是有限的。而对于我国农民工群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通过务工来保障和补充农业生产，相反，而是认为农业是为自己为自己在务工中面对困难时的保障性退路。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作为劳动空间的城市和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存在分割。农村过度承担了劳动力再生产的代价。“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点点。”<sup>[16]</sup>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讲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割，而是并不存在劳动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不是能够和资本的再生产分开的，从劳动力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是不断继起的。劳动力再生产从来就是在城市中不断完成的，并没有在农村空间完成，也因此才形成了宿舍劳动制度和农民工社区，这没有什么特殊和神秘的。正如潘毅自身所说的，“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难道一个劳动力在一年中只有十天半个月需要再生产自己，剩余的 350 天就可以不吃不喝不生活吗？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农村只有在经济周期波动时期，农民工面临以年为单位的摩擦性失业时才承担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另外，农村还承担了大量的劳动力养老成本。不过，这种成本是福利性质的成本，并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对于在乡村居住、在县域务工的高龄农民工而言，似乎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是分割的，实则不然。高龄农民工之所以能够采取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县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空间。要以整体性眼光看待县域中农民工生存方式。

### 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不容改变

农村农业对于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性作用是建立在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之上的。对于西方社会和世界上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圈地运动”而丧失土地的、或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土地的天然的无产者来说，他们作为产业后备军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留在城市流浪和期望社会福利的救助。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还拥有着宝贵的、经历艰苦卓绝地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村土地制度所赋予其资养生计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实际使用权。虽然一些研究认为，农民对所有权的在意程度不高，而只在乎使用权。事实上，这种小农户的实际使用权正式建立在集体性的土地所有制上。农民对所有权采取的淡漠态度也正是建立在稳定的所有权制度上。

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保留着一些以原始的村社制度的形式等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的小农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在这些保留着原始村社土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农民兼工兼农的状况看起来与我国农民工相似，然而其原始村社土地不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得来的、没有得到过社会主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很容易就会被破坏、冲垮。这些国家的小农经济还没有被冲垮很大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还不充分，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经济、务工经济是补充性和改善性的经济。一旦其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快速发展，小农经济就将不复存在。

农村土地所有制对于农民工生活展现出了重大的保障性作用，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生态和谐发展、粮食安全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反对破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农地入市。

一些观点认为，农地入市可以帮助农民获得一定资本，以此在城市立足。贺雪峰批评说：农民土地资产并没有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具有极大的货币价值，农民不能通过出售土地在城市立足。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失去了其自我保障的能力。<sup>[26]</sup>除此之外，还可以提出两点批评：第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议价能力差距极大。同一块土地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效用不同，因此心理价格也不同。土地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财富之母”，在农民手里，土地价值只能以农产品产出为锚点。而一旦在土地上进行资本投入和产业集中，其价值就可以几何式增长。因此，同一块土地对于农民和资本家来说，效用是不同，造成的心理价格也是不同的。农

民和资本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所造成的信息差更加剧了这种价格差距。而作为买方的资本家可以用基于农民的效用心理的价格买入这些土地，再通过投资实现巨大地增值，从而实现一种对农民的剥夺。第二，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工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自我生产产业后备军，这是市场经济的人口规律。农民手里只握有一些货币资本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良好、长期就业，在整个阶级的层面上帮助其实现阶级身份的改变，只是通过货币置换资产的方式释放农民的消费能力和社会的货币流动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以牺牲社会发展潜力为代价获取的流动性和消费能力只会助推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泡沫，无法帮助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无法真正解决农民工阶级在城市无法立足的问题，还将带来扩大化的失业、劳动力价格下降、农产品价格波动增加等问题，破坏社会稳定，透支发展潜力。

### 3.3 打破城市化的神话

在上述部分中，我们论述了农村地区对于我国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有着神奇的魔力，似乎城市化率提高了，人民收入自然就会增加了，经济就自然发展了，一切社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必然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sup>[17]</sup>一些经济学家抨击低度城市化带来严重城乡差距和经济负面影响。城市化真的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吗？

我们不认同对于低度城市化现象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首先，从低度城市化的成因来说，低度城市化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失误造成的畸形体制、户籍制度不是造成低度城市化现象的唯一原因，低度城市化是在复杂社会经济状况下形成的一种合理特点。

社会学界对于低度城市化现象的成因有许多更丰富的解释：“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采取了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重化工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推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二是，中国建立了刚性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对农民流动采取严苛的限制措施。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制分别给农民和城市居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条件，一个人离开了生产队和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国家通过招工、招考、招兵等非常有限、可控的渠

道进行人员流动。限制人员流动的典型制度设置之一是户籍管理制度，它所附带的是城市的就业、粮食、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三是，1949年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化的速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急速增长，在30年时间内几乎增长了一倍，大大迟滞了城镇化进程”<sup>[18]</sup>

其次，低度城市化并不代表着发展失误和一种畸形状态。低度城市化存在着自身的发展优势，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达到共同富裕。

由工业化率高、城市化率低的数据直接推到我国发展存在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病态现象的逻辑过程并不合理。低度城市化理论使用的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化率，则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个劳动力，投入到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去，其创造的产值，必然远远地大于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也就是说，对于相同产值的工业和小农相比，工业能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岗位是远远少于小农经济的。而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中又是采取的以重化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赶超战略，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又不如轻工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保就业一直是中国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和最重要的经济目标之一。因此，在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历史阶段，在保就业的指导目标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是必然和合理的。而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相匹配，并不代表其更先进、合理。而是因为在其“圈地运动”中，农民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只能被迫地向城市流动。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极多的济贫院等机构和巨大的贫民窟。高城市率并不代表真正有这么多人能够安稳地在城市里生活下来。其中有大量的流浪汉和朝不保夕、时常面临失业危机的半失业者。这些都是虚高城市化率中的“水分”。因此，这一统计方法计算出的城市化率的“真实”性存疑。

最后，在生产方式和空间聚集中，生产方式才是决定空间聚集的原因。空间的区位条件当然对于具体的生产方式有所反作用，然而这些反作用首先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正是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而非城市化带来了工业化，不能倒因为果、倒果为因。

### 三、以工为业：高龄农民工顽健的务工倾向

小农经济确实为高龄农民工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保障，但是，农民工们只是将务农视为一种基本保障性的生产，而并不将其视为一种值得投身的事业。乡村的舆论环境认为，只有出去打工，才是“正干”，才能实现致富。采取半城半乡生活方式的高龄农民工们，在农村安居，却不能对农业乐业。他们持续地渴望留在底层雇佣劳动市场。

我们使用“顽健的务工倾向”一词来描述高龄农民工持续性的、强烈的务工意愿。高龄农民工表现出的顽健的务工倾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造成：第一，农民工从事工农业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额以及农业生产尤其是小农生产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推拉效应”；第二，子代带来的家庭消费困境和传统养老文化影响造成的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代际不平衡。一般认为，我国传统养老文化对于农民工养老意愿应该存在正相关性。我们认为，由于传统养老文化没有明确的年龄界限、以丧失劳动能力为界，在退休制的现代养老观念指导下制定的政策，和传统养老文化之间发生摩擦，这种摩擦造成了农民工养老意愿的低下

### 3.1 农民工从事工农业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额

农民工作为城市雇佣劳动力的所能获得的工资报酬要远高于其作为农民进行小农生产所能获得的收入。这是农民顽健的务工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工以雇佣劳动为第一性选择、以农业生产为保障性选择的原因。在 Y 村，一个耕种 15 亩地的农户，在一个平均的年头，一年下来的纯利收入大约也就在 10000 元左右。而本地建筑工地打小工的平均价是 180 元/日。小工对劳动者素质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不符合这种要求的农民工只能进入比建筑行业收入更低一些的非建筑行业打工。但是，不管选择什么工种，只要投入到市场化的雇佣劳动中，其收入仍然要比种地高得多。而这种收益差额有多种原因：

第一，小农生产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雇佣劳动，小农生产的农产品虽然已经市场化，但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商品并没有市场化。农民工在进行小农生产时并不是作为整体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进行社会生产的。在小农生产中，农民根本不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农民工在务工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与劳动力等值的报酬，但是在务农时只是自己劳动，收获自己的劳动产品并通过出售农产品的方式将其转化为货币报酬。因此，小农生产的报酬收益是与社会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脱离的。这给了农民作为农民和农民作为工人之间的

收入差异的可能性。

第二，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代表，机械化大生产所能带来的巨大的生产效率提升是小农生产远远不能比拟的。而粮食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商品，维持粮价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生产的稳定和人民的粮食安全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注定粮食是绝不能够进行金融化定价的。把视野放到全世界来看，农民的货币化收入都是不够的，都是需要补充性的收入的。即使是对于美国这种人地比小，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的国家来说，其农场主仍然严重依赖国家补贴。联合国 2022 年 WTO 通报显示，美国农业补贴总额占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60%。《杂食者的两难》中举过一个例子：农场主乔治耐勒虽然想尽办法提高收入，但是最后仍然需要依赖政府补贴艰难度日<sup>[19]</sup>。这注定了在非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时期，小农生产的劳动产品——粮食货币化后的报酬必然小于农民工出售劳动力的报酬。

第三，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是完全竞争市场。在农业生产中，农户的数量多而且每个农户的生产规模一般都不大，同时，每个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产量及其在整个农产品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都极小，因而，每个农户的生产和销售行为都无法影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能接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 3.2 农业生产尤其是小农生产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

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并不高。在此收入基础上，缺乏集体行动能力的小农生产还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遭受天灾、市场波动和野生动物破坏等等一系列困难影响。失去了强有力的集体组织保障的村庄农民对于这一风险的承受力并不高。

第一，天灾：

Y 村是一个缺水村，没有水浇地。近年来，在全球极端天气多发的整体气候环境下，丰宁县缺水问题持续凸显。今年丰宁地区遭遇旱灾，Y 村全村几乎绝收。

“今年种地白瞎了，一点没得”是村民们普遍的说法。村民吕某贤算过一笔账：

“我也有地，现在还有 10 来亩地，你就光指这点地还不饿死啊。你就拿今年来说吧，今年不是旱灾嘛，你这 10 亩地闹不了 20 筐东西。你这 10 亩地本身，你就得倒贴钱啊，你这么算呀，你挑一亩地 4、50，种一亩地 6、70，这连挑带种这就 100 多。你再加上化肥钱，一亩地是一袋化肥，这一袋化肥那是 100 来块，这就 200 来块。再加上籽儿钱呢，这就 3、400，你还得种着呢。今年这年头比

起好年头啊，就跟没得东西一样。你假如说是下点雨吧啊，你能得点庄稼，你像咱北方人，这地方你浇不了。浇不上那就凭天收。上岁数人有这话：5月旱不算旱，6月来雨吃饱饭。你就拿咱们今年来说，6月份是哪儿来的雨啊，丁点雨没下。5月长秧子，6月包穗跑花灌浆子，一点雨没有，那棒子甩不出来。种棒子倒是饿不死，就是不挣钱了，见苗七分收，你假如说种啥吃啥，再不够也够你吃的。就我今年这么不收我要是就吃棒子面饼子棒子面粥，那一年我能喂饱了一家。但是现在谁家能吃一年这个啊？也吃不下啊要是不绝收啊，种地一年也能弄个万八千。Y村往年来说，最好的年头是一亩地1200斤，这两年一亩地打800斤棒子就不错。好年头的时候，一亩地闹4、500块钱的收入就得了。”



图2 种植棒子（玉米）是Y村村民的选择之一

没有集体组织的保障，Y 村村民农业经营的亏损后果只能自己吞下。

灌溉对于农业经营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Z 村位于 Y 村稍微北部一些的位置，有一定的水浇地。Z 村村主任杨某龙告诉我们：“我们村有 5600 亩地。今年闹旱灾，我们这边是说：见苗七分收，今年是苗都没有见到。但是好在我们这里有将近 750 亩水浇地。这 750 亩水浇地没有减产，今年因为旱灾的原因，一亩地的纯利能高达 900 元。我们这边西山那片多了一场山前雨，也顶了一点事。这样就给我村里种地的收入拉平了。”

而灌溉是一种重要的集体性行动<sup>[20]</sup>，这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和一个坚强的集体领导核心。Y 村在脱贫攻坚战开始前，对于农业的治理能力几乎为 0。脱贫攻坚战开始后，由于有了驻村工作队这样一个坚强的村集体行动的 leadership 核心，Y 村改造了百亩梯田，并且多次尝试打机井和引水。梯田虽然能够保持水土，留存雨水，便于机械化耕种，但是在毫无降雨的干旱年份用处不大，打机井和引水的尝试也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屡屡受挫。乡村振兴开始后，虽然更换了一批驻村工作队，但是打机井仍然是新任驻村工作队不懈努力的目标。在我们今年调研期间，Y 村发现了一个可以打出水的位置，正在趁冬季农闲时刻加紧施工，今年有望打上第一口可供灌溉的机井。不过，打机井抽取地下水收到华北平原整体地下水条件的极大制约。

## 第二，市场风险：

农民生产粮食，市场波动较小，但是很难实现增收目的。经营畜牧业，能为村民提高一定的收入。不过这意味着放弃一些务农工会，至少需要一个人照料牲口，有比较高的机会成本。如村民 L 告诉我们，以往他可以将牛放到后山，牛吃山里草即可，不需用料、不需清粪便，也不爱生病。如今为保护环境，禁止在后山放牧，只能自己养殖、喂饲料、清理粪便，而他要务工，因此他也养不了牲口。除了养殖大户以外，农民若想不影响自己打零工，则只有一些兼营的养殖业：如养极少量的鸡、极少量的兔子。这种规模的养殖一般不能带来什么收益，其产品都供自家消费了。养驴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养一头母驴，购置来小驴仔花费 10000 元，平时可以做劳动力用，若养几年后，成功配种生下小驴，可卖 8000 元。且驴好养活，若打工，嘱托给邻居填填料即可。不过养驴并不能上规模，最多养一头两头。而经营畜牧业也有一定的困难。一方面是养殖业需要一定的原始

资本积累，如村民丛某华就有比较强烈的养牲畜的意愿，但是因为儿子结婚导致的债务很重，没有办法养殖。关于她的访谈我们放到了后面有关农村婚恋问题的部分。另一方面，经营畜牧业还面临牲畜病死、牲畜价格市场波动等风险。比如说今年的牛价，一头 700-800 斤的牛只能卖到 7000-8000 元，往年则能卖到 10000 元以上。牛价非常低，和羊价格一样。Y 村 4 组组长王某新就是养羊养鸡失败后改行跑北京——丰宁一线的黑车。





图 3-图 5 Y 村村民经营畜牧业实景

如果生产一些其他农作物，则面临无法对接市场的困难。Y 村上一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L 同志曾根据 Y 村独特的高海拔、昼夜温差大、土地贫瘠干旱等特点，经过多次外出考察、调研，将藜麦这个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全营养植物作为 Y 村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由于缺少种植技术，多次邀请省谷子所、外国专家局及外籍专家来村进行技术指导与培训，编写了藜麦手册，成立了村集体企业，注册了产品商标。为了打开销路，又与内蒙古田也粮行深度合作，按照市场化模式推广销售藜麦原粮。2019 年 5 月份带队参加了京津冀优质农产品展销会，8 月份又参加了第四届国家藜麦发展高峰论坛，2020 年 8 月又在河北日报的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宣传销售，当时的直播销售活动我也参与了。Y 村的藜麦产品在县内有丰宁宾馆、丰宁非物质文化展厅、大滩呆呆民宿和有才庄园等进行展示销售，在县外已经正式进入京港澳涿州服务区、京昆涿水服务区和冬奥会举办地崇

礼服务区，同时开设了淘宝网店进行线上销售。在这些种种努力下，Y村藜麦产业总共带动26户贫困户增收12万元，通过产品销售为村集体增收近20万元。从选品到引种再到销售，没有一步是孤立的小农个人可以完成的。而在L同志卸任后，由于不同干部思路不同、用力点不同，对藜麦产业的支持没有原先的力度，Y村的藜麦产业发展呈现停滞乃至萎缩的态势。



图6 Y村土地贫瘠干旱

由于农业是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大规模经营农产品的话，还要承担很大的市场波动风险。村副主任郑某岩今年承包了几百亩地种植储青饲料。然而，由于大旱灾的影响，大部分玉米种植户只能被迫将玉米改作储青出售，这就导致了储青价格大下降，郑某岩承包种植储青饲料的生意也只能以亏损的结局暗淡收场。

第三，野生动物侵扰：

6组位于Y村的半山腰，是海拔位置最高的一组，受到野生动物侵袭的次数也最多。6组组长耿某义家养了十几只鸡，冬天被山狸子咬死了6只。耿某义在家里设夹子，夹死了山猫一只。

村民们说：“而且这个野猪、山鸡啥的祸害这庄稼人的庄稼，你打他还犯法！你说今年开始打野猪不犯法，你怎么弄他？你没枪！过去我小时候有火枪，就像这野鸡、兔子、山猪啊，都给它打了，他不祸害这庄稼。就这野鸡，等那棒子苗长这么高，那野鸡上这棒子根底下给你凿那么大个眼，把棒子苗一叨一吃，按着垄的叨，等棒子苗出这么高看着挺好，仔细一瞅全晒败了，它根都死了。还有这山猪，祸害人，一片棒子下来连吃带地抹就败光了。还有獾、貉子。这个貉子是

最能祸害庄稼的。他按理说要赔偿，过去那会我就上去找过，到时候就和你说他找他、他找他、他找他，谁包？没人包你。”

### 3.3 家庭消费困境和文化建设

子代转移、代际剥削是理解当今农村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众多<sup>[21]</sup>。在农村家庭关系中，娶媳妇是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议题，子代对老人造成的众多其他问题都围绕和附着在这一基础之上，因而成为我们理解农村代际关系的核心。贷款买楼、买车、彩礼都是为娶媳妇这一核心议题服务的。我在这里使用娶媳妇这个概念而不使用婚姻这个概念，旨在突出此处农村男性青年和男性青年家庭的主动性。青年女性则面临另一种困境，而她们的居住地往往不在农村。

我们来看看吕某贤家的例子：

姓名	身份	性别	年龄	学历	背景信息	是否低保户
吕某贤	户主	男	59	小学	有大狗，建筑零工	是
任某环	妻	女	58	小学	建筑零工，提出要打道占地证明	是
吕某鹏	子	男	25	初中	南辛营汽车修理店小工	是

“刘泽乾：隔壁郑某国家，我刚从他家回来，他小子说媳妇我看还邻里地该了不少钱。

吕某贤：这年头说媳妇，谁家的不该啊？要是一说要这个楼，家家都得该。说个媳妇彩礼最少是你得拿 10 万。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人家拉扯个丫头拉扯 20 来年，人家不闹个养老费啊。再加上三金啥的十来万，加起来小 30 万了。拿我们家这房子说吧，为什么没盖新的，一方面也穷，另一方面你有孩子啊，你孩子说媳妇，这民房他不要！她还要个车呢。你在县城里买个楼，买个 120、130 的，就得 100 来万。你那个 20、30 万首付，你还得该个 50、60 万贷款吧？住完这新楼，你就跟租房一样，你还得还房贷。这小孩结了婚，一年多就得有小孩儿了，等有了这小孩，孩子哭老婆叫，他这一天能挣多少钱？他再养活着这孩子、

养活着这媳妇，这媳妇哄着孩子出不去，这就得一个人挣钱养活俩，再加上这楼贷到月就得还。等他这俩孩子拉扯大了，这房贷也换完了，也就到今天咯（指儿辈像吕某贤现在的年纪一样，该再扶持孙辈了）。要是老的再摊上病秧子这个，更完蛋。所以说就是两个肩膀头子扛个脑袋，能干一天是一天，这是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说靠土里刨食，你挣到哪辈子去？”

可以看到，围绕着娶媳妇这个核心议题的展开的购房、购车乃至后续孩子抚养问题给高龄农民工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压力。

一些观点认为，农村的超前消费是极大的陋习。农民买车、买楼或住大平房很大程度上是攀比心理作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文化建设对解决以娶媳妇为核心的乡村超前消费问题具有帮助<sup>[22]</sup>。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买房或者住大房子、买车、彩礼除了受攀比心理和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外，还有其一定的经济道理。至于婚礼宴席大操大办等铺张浪费的陋习、好赌博的陋习，则的确应该得到有力整治。

我们可以看看上文所说的隔壁郑某国家的例子：

姓名	身份	性别	年龄	学历	背景信息	是否常住
郑某国	户主	男	52	初中	北京暖气安装工	是
丛某华	妻	女	51	小学	在家待着，张某平（村会计）丈夫的妹妹。	是
郑某宇	长子	男	29		南辛营福田汽车配件厂务工。	是
金某敏	长媳	女	25	初中	丰宁明艳玻璃厂	是
郑某达	次子	男	14		在丰宁四中上学。	是
郑某杰	孙	男	2			是

“丛某华：我儿子、媳妇都在西川那边的汽配厂啊，他们在那打工。去年夏天给人送了一段水，今年没事干去人家那干了没啥文化，干不了别的。我儿媳妇也是在家哄孩子，才去俩月。一个月拿不到 4000 块钱，不去没地方去。

刘泽乾：你儿子儿媳他平时咋回来？

丛某华：他回来开车回来嘛。这年头说媳妇不都要楼要车，这不都是说媳妇的时候买回来的嘛。我这个房子结婚前装修的，那会是危房改造，国家补贴了一

部分，装修也花了8w块钱来的。刘泽乾：你们怎么不养点牲口？

丛某华：我也说养点牲口，要不老了打工也没人要了，就喂点牲口呗。没钱嘛。说上这个媳妇也花了不少钱呢。说媳妇就该（该，即欠）人家30来万呢，也是挣点钱就忙着得还人家，你老是该着人家也不行啊，挣点钱就忙着还人家。

刘泽乾：你跟银行借的还是个人借的？

丛某华：不是搁银行借的。银行借的更借不上，还得给利息。就是个人的，大伙帮衬着借的。所以说没有钱买牲口，挣点钱赶紧还人家，不能一直该着人家钱一下好几年是不是。”

丛某华家的确因为装修平房、买车、给彩礼背上了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阻碍了其试图购置牲口的增收之路。然而，装修改造危房是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买汽车才让其儿子儿媳可以扩大生存和就业范围、而其儿媳一直在丛某华家充当家务和务工的劳动力，因此，在农民们看来，向亲家支付彩礼也是合理的。我们今天看彩礼文化，认为其不合理，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家庭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代际关系失衡<sup>[23]</sup>。从前的家庭关系中，家长主导了整个家庭的中心。此时，彩礼更像是“购买”了一个劳动力的费用。而在如今的代际关系中，家长不仅不能主导整个家庭，还要为子代承担家务和代际转移支付等任务。结婚本身并不仅仅是给旧家庭带来新劳动力，更是给旧家庭尤其是家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彩礼”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受到批评和争议。

赓续家族血脉的婚姻在目前的乡村文化意义世界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娶上媳妇，农民工家庭苦于巨大的婚姻支出；娶不上媳妇，农民工家庭则在意义世界中处于极大的虚无和痛苦。农村扶贫讲“扶贫先扶志”，所谓“没有志气”的对象中，绝大部分是大龄单身汉。对于大龄农村单身汉而言，媳妇都娶不上，没个“就伴”的人，往后看又“绝了后了”，什么希望都没有，混吃等死，有点钱就去吃喝嫖赌了，基层干部、扶贫干部和家人亲戚苦口婆心做再多工作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悲观和消极的心态。这些单身汉年老之后又成为五保户，五保户依靠国家补贴生存，没有子代，欲望很低，荒废土地，热衷打牌，不仅助长农村不良风气，而且也让其他正常勤恳务农务工的村民颇有怨言，滋长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一些基层干部也对此颇有微词。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大龄单身农民工的

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二十年后，五保户的数量将迅速增加，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王某林家的情况比较能体现这个特点。现将我和王某林一部分的交流摘录如下：

姓名	身份	性别	年龄	学历	背景信息	是否常住
王某林	户主	男	78	小学	脱贫户，低保，四级肢体残疾，养 2 牛，危房 110 号未拆	是
王某朋	独子	男	44	初中	脱贫户，外沟门乡打工	是

“刘泽乾：你怎么把牛养院子里？”

王某林：对。没地儿放去。那会儿，你父亲在的时候，有仨头牛，现在就俩了。卖给我侄女他们了。卖了两只。两只卖一万五。都是小牛犊吗。就像这样的，不大。你说卖贵了她不要，贱了，那是我亲侄女，照顾照顾她。种着地呢。种了不到二亩地。今年种地白瞎了，一点没得。

刘泽乾：您养牛，不得把粪都铲走呀？

王某林：没东西来弄呀。以前可以用驴来弄（拉牛粪）。后来毛驴被烧死了，我也弄不走了，我这儿太岁数大，啥都弄不了。没驴了，原来那时候有驴，失火的时候毛驴被烧死了，就在东边那里。

刘泽乾：你看看你这屋磕碜的！上次来就这么磕碜，你这新房住了没两年吧？怎么又弄得这么乱糟糟的，收拾收拾。旁边那半间怎么不盖起来。

王某林：是！刘泽乾：你和你小子都不收拾？

王某林：不收拾。嘿嘿嘿（呵呵傻笑）。

刘泽乾：你家小子有对象了吗？

王某林：他没有对象，还没有，整天就打工了，自己过。他就在家里边玩手机，然后他就走了，玩去了。打牌去了。在小卖铺。我也不说，说也说不了。嘿，天天打牌，他挣一年也不够他造的。他也挣不着钱我估计，挣不着钱，没钱。

刘泽乾：他这一年里什么时候回来？在哪打工呀？

王某林：他过年回来。他在哪边的某个部门打工呢（王某林也不清楚）。嘿，打工也挣不了多少钱，一天挣 150 来块钱，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我也说不了他，我俩也不沟通，我做饭他也不吃。到时候他没钱揭不开锅，他就跟我要，

要了我也得给。我倒没花他钱。这不是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这草莓也是他买的。这草莓还不赖。

刘泽乾：你家小子是一直这样，还是说有哪年受刺激了？

王某林：他就是谈不上媳妇难受了，就没上进劲了。谈不上媳妇，觉得自己这辈子也是自个儿一个人了。他就这种思想。”



图7 王某林家乱糟糟的屋子

王某林本身是低保户，王某林的儿子王某朋，44岁，至今单身。王某林家无人做卫生，乱糟糟一片，牛养在院子里，牛粪不收拾。王某朋在外务工，过年回家后每天没有别的事，就是打牌，钱也留不住。村里好打牌的多，因此欠下一屁股烂账的也很多。村里小卖部后房开的棋牌室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地点。王某林和王某朋的父子关系并不算良好，王某林不想让他继续打牌，但是王某朋不听，两人不怎么交流。不过王某林心态很好，见到我很开心，还记得20年8.1节慰问退伍老兵时我去看望他的事情。

### 3.4 传统养老文化影响下的低养老意愿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意愿并不高，继续劳动的意愿反而很高。养老主要有两个现实的困难：第一，子代消费压力带来的“代际剥削”造成了高龄农民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工作。第二，由于高龄农民工在外打工时不愿意缴纳社保（即使是今天的年轻务工者也有很大的不愿意缴纳社保的倾向），加之其务工的年代

用工不规范、流动性工作导致社保经常断缴等原因，第一代农民工老去之后普遍只有最基本的养老金100-200元，一些有残疾的持证人士还有几百元不等的医保，这些资金不足以支撑其养老生活。

村民吕某贤说：“……养老的事你就先别打算了！你得等到说上媳妇儿。你还得帮忙给他还回贷款吧，你不能瞅着他。拉老婆带孩子再还这楼贷闹不转了吧。就像这村的人，甭说那养老。你这样这年头没有你养老的一说。只要说这你没害大病，你没瘫床上。你只要能动弹，你就先别说养老，谁家都这样。假如说跟你们所说的吧，干工作的，到60退休了，他有养老金、他有退休金，再一个生病长灾吧国家还有待遇，庄稼人比不了。你城里人一个月拿5、6000。庄稼人拿100来块，这一百块连吃带嚼一个月能干啥？谁不想买点好吃的啊？越岁数大越馋，这100块能干啥啊？你也甭抱怨，你也甭比，你比不上当官的你比要饭的，比那桥洞子底下，涵洞子里要饭的还是强点。就等你在这儿营子干工作，没事儿，你溜达着你瞅去吧。只要是他没死呢，他没瘫在炕上的，能干哪样就得干哪样，人还要你你打点工，没人要你你就回来种地吧……”

被忽略的一个点在于：高龄农民工养老意愿低下还受到乡村传统养老观在现实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异化的影响。流行的观点认为，尊老养老是中华文明植根已久的传统，当今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是对传统养老观的破坏和反动。我们认为，当今高龄农民工养老意愿低下正是乡村传统养老观在不同社会基础下的自然流变和异化。抽象的认为中华民族重视养老因而与当今高龄农民工低下的养老意愿冲突的认识无助于理解社会现实。

传统社会的农民养老有以下几种：一是地主阶级的养老。地主阶级的养老是封建养老观最完整的形式，对于地主阶级来说，从来就是被供养者，不需要参与劳动；二是贫农的养老。贫农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维持生计对贫农而言已经是极大的困难，养老对其而言是一种虚幻的观念而非现实的存在；三是中农富农的养老。对于中农、富农来说，土地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而多子多福观念下一家之劳动力是过剩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缓慢的。因此，有限的土地交给子代耕作即可，父辈在一定年龄后就可以不再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不过，这也不代表父辈母辈就完全退出劳动生产，他们往往还会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生产，直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止。

因此，没有明确的年龄边界、往往以丧失劳动可能性为界是中国传统的养老观的一个不受学界重视、但是却极其显著的特点。所谓劳动可能性的丧失有两种形式：一是丧失劳动能力、二是由于劳动资料不足，将有限的劳动资料分配给更优质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在今天，由于农民工可以务工为生、乡村空心化造成的土地剩余，劳动资料不足已经不再成为限制老年人劳动的条件。于是，丧失劳动能力后再开始养老成为传统养老观唯一的形式。这样才塑造了“老人不老”的情况。

现在主流所提倡的、具有明确年龄规划的养老观，则根源于城市体制内的单位制。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推行的单位制注重维护工人利益。因此，单位制下的工厂工人有规定年龄的退休制度和相应的高额退休金、几十年来缴纳的各种保险做养老保障。60岁（55岁）“到点退休”是这种养老观的根源。建筑用工行业60岁一刀切的定点清退政策就是从这种养老观出发制定政策的具体体现。但是，这种思想根源在农村没有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两种养老观念之间的错位造成了相关政策不受拥护的状况。

## 五、县域：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空间

整体来看，由于在劳动力市场的被排斥境遇，高龄农民工被迫下沉。这一下沉以城市用工部门上的降级为过渡，最终呈现为大城市到本地县、乡、村的空间挪移，因而出现了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的社会现象。而由于高龄农民工在社会的“城市—乡村”区分体系中显现为半城半乡的生活样态、在经济的“工业—农业”区分体系中显现为半工半农的生产样态，他们综合了工业、农业两种生产形式，联结了城市、乡村两种地域划分，这使得我们难以通过传统区分对其进行直接的、内在化的分析，“县域”这一综合性的概念则为精准描述高龄农民工的生存样态提供了可能性。向上，县域承载了大城市抛弃的回流劳动力；向下，县域统筹着一整个区域的协调统一发展。

县域，是一种“即以县城为中心、以小城镇/集镇为节点、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层级分明而又高度整合的新经济社会空间”，在社会区分体系中容纳了县城、乡镇和农村三级地域，从经济分工体系看则兼容了工业、农业两种生产形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经济社会空间。这种经济社会空间的整体性表现

为：高龄农民工往往在乡村居住、以务农为一种生活保障，但在工作上仍然高度依赖县城、乡镇经济所提供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以高龄农民工们的生产和生活为线索，打破了原有的空间割裂形态，形成了横跨城乡的新社会经济空间。县域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以村庄为基础，其中县城、乡镇是作为主要的生产空间，村庄则是主要生活空间并供给了部分保障性的生产。县域这一层级分明而又高度整合的新社会经济空间的形成，重塑了社会空间，又重构造了社会形态。

县域这一社会经济空间的形成，以县域经济社会功能的发展为前提。县域经济从“大城市的脚”变为“乡村的脑”。

### 5.1 县域如何承载高龄农民工的务工诉求

农民工是县域整体经济社会空间形成的主体动力。高龄农民工回归县域，主要是因为，其在具有顽健的务工倾向的动力驱动下，失去了在大城市务工劳动市场立足的能力。这种回归，并不是纯粹向农业农村的回归，县域务工劳动力市场承载了农民工的务工需求。县域为何能承载这种务工需求？

首先，是县域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岗位。虽然河北在东部省份中属于落后省份，但是仍然有本地就业的趋势。县域经济主要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业、制造型工业为主，这些工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低层次劳动力可以直接与县域的雇佣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其次，在短期务工条件下，县域企业对于城市用工限制和用工保障的政策贯彻性较低，一些超龄农民工也可以获得没有合同的就业机会，而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对社保、合同等就业要素的反应程度又较小；最后，由于县域劳动力市场价格较低，许多年轻劳动力被城市所吸纳，县域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空缺状态。这些都为高龄农民工的雇佣提供了可能性。

以农民工为主体推动的县域综合空间的形成，以县域内的便捷交通为直接缘由。受国家在脱贫攻坚战中大量基础设施投入的影响，县域成为一个内部互通的“城乡结合部”。从2018年到2020年，Y村驻村工作书记积极争取县交通局、财政局增拨资金30万元，铺设了一条4.5米宽、5公里长的硬化路直接与111国道连通，将这个“大山深处贫困村”变成了“县城城郊村”，主路和小街小巷全部硬化，总计约40000平方米。搭设重建了4座小桥，新增太阳能路灯145盏，当时的路修到位于整个村庄中部的村部位置。到了2024年，Y村已经彻底

实现村村通、户户通。从村部到大山深处的6组位置全部通上了硬化路，这使得汽车可以方便的进出村庄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使得在县域经济中“半工半耕”成为可能。因此，正是缘于交通的便捷程度达到了一边务农、一边去县城打零工而不互相耽误的程度，半城半乡、半工半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才具有了直接凭依。

高龄农民工的县域综合空间创造还直接与县域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和熟人社会直接相关。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熟人社会由农村扩展到县域，通过“私人关系”寻找就业成为县域内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方面，血缘、人情等联结起的私人关系可以帮助高龄农民工更灵活地获取用工信息、争取用工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县域部分工作机会相对缺乏合同保障，熟人关系则为农民工获得收入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关于熟人社会对于农民工就业的帮助，在我们的以下访谈对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泽乾：你现在出去找活在县城周边还是北京天津承德？”

吕某贤：县城周边找找。人家（大城市）用你啊！你像我这岁数（59）了他不用了。在咱们县里面附近找点活，有个老熟人，上不上保险的你干吧，还能干点。你上天津北京人不用你了！等过了60了，保险就上不上了，外面不用你了，就回县城找点活干，不行打扫打扫卫生，在县城住着的不行捡点破烂，看看大门，也就干点这个呗。

刘泽乾：你在哪打工？

吕某贤：我在西川那个下燕窝知道吧，那块有个卓凯拆解，我在那干呢。过去我是瓦工，谁家盖房我给人盖房，以砌砖为主，现在盖得楼吧，一体框架，打灰，打完灰就是装档子去了，似乎也没什么活。等装完档子之后做隔断，这算是有点活，你找点亲朋近枝，就盖上了，别人你进不去，所以说瓦工也没活了。所以就跟着人家哪盖楼房你跟着打打地基、挖挖边沟子、打打井啊。干点杂活。以前有技术，干1天能干到350元，后来干杂活也弄300，这两年杂活也干不上。过去几年干活一直干到上秋，混凝土上冻了，不让打了，就不干了。现在夏天有时候也没活，一夏天都没活。”

## 5.2 县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社会空间

第一，相对于传统农村而言，县域经济可以集中资源、扩展竞争力。县域经济超越了“一村一品”的限制，增强了统筹能力，并且将“品”的范围由特殊农

产品扩展到囊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全链条产业链，可以更好地规避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农业过度竞争、难以积累财富的情况，能够形成规模竞争力。如在对Y村基层干部的采访过程中，他们便表达了对河北沧州肃宁县将针织衫、皮草、鱼竿三大产业分配给各个村庄生产，又依靠县域的统筹实现来料（养殖）、市场集散、加工、研发设计、内外贸易完整产业链条这一模式的“羡慕”。而近年来县域投资的扩大、产业的发展，也为回归农民工提供了工作岗位。

第二，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村出现了集体力量的缺位。这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造成了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经济依赖资本下乡、社会治理依赖少数乡贤的状况。中国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的乡村衰落，特别是社会性衰落和制度性衰落，其本质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普遍下降，它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生活凋敝、乡土文化式微、自组织能力低下、村民合作困难、管理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sup>[24]</sup>尽管在驻村扶贫工作队进驻后，村民无组织、集体无领导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想要在乡村地区重新建成高水平的乡村共同体仍然困难重重。而县域中的公共权力仍有良好的保存，这是以县为单位统筹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建设强有力的抓手。

第三，在社会建设方面，县域配套的公共设施、公共福利更为完善，相比于乡村能够更好满足农民工教育、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的需要。如在教育方面，税费改革后，税费改革不但促进了“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而且也能够保证县级财政有比较足够的财力来发放教师工资。换句话说，“以县为主”紧跟在税费改革之后实行，实际上是把税费改革带来的县级财政增收给了教育，这使得县域教育水平能够较乡镇有质的提升。<sup>[25]</sup>以Y村村小为例，人群的居住分散加上严重的空心化使得Y村小学常年只有个位数的学生、一位校长兼老师，Z村小学原有400余学生，现在只有13人。但如果村民子女从农村到县城上学，一个月要缴纳校车费用240元，在小餐桌吃一顿中午饭要花费10元，一个月按22天收费共收取220元。一个月共支出460元。一年按10个月计算，需支出4600元。这一笔费用对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一笔小钱，给农村居民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一些村民想尽办法想要争取减免校车费用的政策。

医疗方面的状况也是相似的。Y村只有一名工资微薄的村医，还抚养着孩子。她对这个工作是颇为抱怨的。而对于村民而言，只有在买个眼药水之类的非常普通的药物时，村民们才会到村医那里去。村民们对村医也没有什么信任度。

县域空间的整体化发展，要求更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县域空间承载的隐形社会服务压力要远远超过表面上的社会服务压力。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额常年处于高位。这是由于大量流动人口造成的。这些流动农民工在还作为劳动力的时期，就仍然离不开其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子女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当其进入老龄化状态后，更是几乎完全依赖本地县域的社会服务。一个农民工，流动到大中型城市，为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创造效益，进行赋能，而这一农民工对于县域而言，则是隐形的社会保障压力。要保障这种隐形的社会压力得到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只依靠地方财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县域社会的持续性发展，离不开中央财政的统筹规划和专项转移支付。

### 5.3 县域空间的发展困境及其解决前景

就县域作为经济空间来看，由于非农就业空间有限，县域难以解决经济的内生性问题。在我们所分析高龄农民工县域回归现象之中，“回归”以“出逃”为前提，一方面，若非超龄导致的被排斥境遇，县域本身的社会经济空间难以具有足够吸引力，从而成为农民工的自觉选项；而另一方面，若非在超龄前储蓄了一定的资金，县域本身的社会经济空间难以提供足以满足家庭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收入机会。与此同时，“回归”带来的消费并未真正反哺于产业发展、经济转型，这使得第二代、第三代的农民工的“出逃”依旧具有必然性。我们展开调研的Y村属于东部地区中的不发达地区，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这一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了第二产业衰退的“逆工业化”现象。

目前，高龄农民工的县域回归主要是带动了以房地产为核心的、一次性的消费。许多农民工回乡后，立刻掏空全部积蓄，在县城买房或者在乡村盖楼，这虽然带动了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县域产业的发展，但是也使得县域经济仍然呈现出一种缺乏持续消费能力、缺乏产业赋能和经济活力的面貌。县域经济依然严重依赖“打工经济”，无法解决县域经济内部循环的内生性问题。而县域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严重依赖资本、过度投资，热衷于“上马”干项目，不

考虑资本回报率,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货币进入企业部门而不能进入居民部门,并且在企业部门内部的流转也由于财务问题阻塞,造成了县城消费无力、乘数效应得不到释放。

县域财政债台高筑的问题不能通过削弱县域公权力的施政导向解决。当前,部分地区开始缩减县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数量,这一行动得到了一些媒体“喉舌”的大力鼓吹。但实际上,公务员、事业编等工资支出在地方债务问题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公务员、事业编的工资支出由于全部进入居民部门,能够发挥乘数效应、推动县城消费增长,有益于县域经济的内生性发展。第一,缩减县城公务员、事业编数量会导致县域重要消费人口消费能力下降,消费萎靡;第二,缩减县城公务员、事业编数量会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就业竞争加大,劳动力价格下降,居民收入减少;第三,缩减县城公务员、事业编数量会导致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减弱,公共服务成本上升,让居民消费更加困难。以上三点都具有很强的负乘数效应,对于县城经济的恶劣影响是乘数级别的。对于人口净流出县而言,这种饮鸩止渴、避重就轻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人口流失和社会塌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削减公权力势必会影响县域社会治理能力,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经济空间之外,县域空间内的主体还面临着意义世界的崩塌危机。县域空间内的社会主体存在大量的闲暇时间,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资源匹配,而抖音快手风靡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空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易现,也表征了县域空间面临的共同文化困境,为意义世界重建提出了更高要求。泛滥的赌博、大操大办的婚礼、高额的彩礼、性困境和色情产业的发展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县域境内的文化和社会建设工作解决。人民群众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并不能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到理解和满意,造成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工作虽然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一面,却不够重视“一切依赖人民群众”。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的过程中,采取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感的手段,将为解决县域空间的文化困境提供出路。

总而言之,推动县域空间的完善必须成为未来的重要政策着力点。这一完善以产业转型为前提、以社会样态的整体重塑为目标。其中,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的改造,一方面则是乡镇、县城本身的“城市化”进程赓续。就前者而言,小农经济的分散生产必然为更为集中、先进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然而相对“高

效”的土地私有化方式，尤其是外引资本的大规模私有化，却会不可逆转地破坏中国底层人民群众的最后生存保障、损害县域经济的平衡，也会使得民众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更多体验到的不是参与感、获得感而是剥夺感。因此，对以共同体为单位的集体经营方式的保留是农业规模化改造中的必然要求。而县域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城市”联结点，尽管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大城市提供了“收容”性补充，劳动力水平的整体性提高却提出了产业升级要求，因此，以县为单位、镇为主干、村为细胞的经济自觉成为必要。在这里，东部地区实际上为中西部提供了参考和示范。同时，以县域一体化联结为核心的整体社会升级则是当前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维度，必须坚持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向。

##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2023
-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 [http://www.lswz.gov.cn/html/xinwen/2023-02/13/content\\_273655.shtml](http://www.lswz.gov.cn/html/xinwen/2023-02/13/content_273655.shtml).2023
- [3] 王欧《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 年 1 月 30 日(A05)
- [4] 如张宗益，周勇，卢顺霞，陈义华.《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J].统计研究. 2007(12); 吴方卫，康姣姣.《农民工流向选择和区域流动变化研究——基于河南省农民工流向的经验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9(12)
- [5] 如石智雷，薛文玲.《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03); 张世勇，王山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机制和趋势》[J].文化纵横. 2019(03).
- [6] 如武力.1949—2006 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1).
- [7] 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8]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 2015,36(09)
- [9]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 [10]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读书.2006(02).
- [11] 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上半程与下半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9(02)

[12] 于亿亿,冯淑怡.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J/O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 侯佳宁,肖德.县域政府投资的空间“挤出效应”研究——以湖北62个县域经济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22(11).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异地扶贫搬迁规划.https://www.gov.cn/xinwen/2016-10/31/content\_5126509.htm.2016.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2.p164

[16] 潘毅,卢晖临,严海蓉,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06).

[17] 刘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

[18] 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2).

[19] (美)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著,邓子衿译.《杂食者的两难 食物的自然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P23-51.

[20] 王亚华,苏毅清,舒全峰.《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03)[15]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3,(05).

[21] 如王德福,徐嘉鸿.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02).

韦艳,姜全保.代内剥削与代际剥削?——基于九省百村调查的中国农村彩礼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7,(05):57-69.

何倩倩.城镇化、家庭再生产压力与代际关系重构——以北方农村“老人不老”现象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9,(12).

李军,李敬.代际剥削?彩礼习俗与农村父母健康[J].人口与发展,2023,29(01).

[22]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4).

[23]王德福.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02).

[24]王亚华,苏毅清,舒全峰.《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03).

[25]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M].上海三联书店,2012.

# **Back to Hometown: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Return to County-Level Areas**

**Supervisor:** Jiao Changquan

**Team Members:** Liu Zeqian, Jiang Ruxue, Liu Dawei, Guan Chenqing, Li Zimu, Yang Zhenkai

**Abstract:**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ges, the group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society. The question of their futur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ractical and social issue.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Y Village in Fengning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Chengde City, Hebei Province, with addition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Z Village and Xingyi City, Guizhou Provin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ata sorting, the author has gathered primary data to summarize the phenomenon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older migrant workers are often pushed back to their county-level regions by the urban labor market's exclusion. Despite the rural areas providing production and living security for these workers, their strong inclination to work is evident due to the wage dispar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workers, the ins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consumption predicament caused by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low willingness to retire in the countryside. Therefore, the main type of return to the county for older migrant workers is to rely on the land ownership provided by rural collectives for their subsistence, while actively seeking possible work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county. This shapes a "semi-urban and semi-rural" family life pattern based on a production mode of "part-time labor and part-time agriculture," with the main aspects being semi-city and semi-work, and the supportive aspects being semi-countryside and semi-agriculture.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type, there are also supplementary types based on wealthier conditions and variant types of passive urbanization whe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Overall, the return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county-level regions continuously shapes the county into a new,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space, reshaping social space and restructuring social forms, signifying an important societal trend for the future. The county space is centered on the county town, supported by townships as nodes, and based on villages as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county town and townships serving as the main production spaces, and villages as the main living spaces while also providing some supportive production. This internal hierarchy is distinct yet highly integrated.

**Keywords:** Older Migrant Workers, Semi-urban and Semi-rural, Part-time Labor and Part-time Agriculture, County Space

## 致 谢

首先，我想感谢本文的指导老师焦长权老师，焦老师是我开始进入社会调研领域的引路人。此外，我还要感谢宋朝龙老师、清华大学严海蓉老师、社科院大学宋丽娜老师三位老师提供的前往贵州调研的机会和言传身教、答疑解惑。

我还要感谢 Y 村两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栗同志、于同志。我三次驻扎 Y 村，多蒙你们照顾。人民群众对你们的爱戴和认可也让我的调研工作格外顺利。感谢所有扶贫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你们辛苦了。

感谢广大劳动群众，人民群众是朴实可爱和伟大的，这不是抽象认识，是我在了解和接受你们的缺点后的自觉情感。

感谢邵显越、姜如雪两位学姐对本文的重要指导和修改，感谢刘大为、官宸庆、李子木、杨峥恺四位同学为本文做出的工作。

感谢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响应您们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是我们深入农村的初心。